

生态民族学的现代价值与多样化形式探究

罗静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文章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论述了生态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多样化的发展形式,进一步得出生态民族学现今在中国的发展形态主要是民族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两种形式,从而总结出生态民族学发展在现代的价值。

【关键词】生态民族学; 民族文化生态村; 生态博物馆

生态人类学这一概念自西方被引进后与中国自身实际相结合,之后不断以学科形态进行发展,之间经历了很长一段历程。尹绍亭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研究,以“刀耕火种”这一生产方式为切入点,对于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视角与看法,转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些固有想法。最近几十年,民族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模式的兴起,逐渐把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保护相融这一有效模式推广开来,这一模式同时也是生态民族学不断中国化的真实写照。

一、生态民族学的引入与发展

(一) 生态民族学简述

生态民族学是一门主要以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人类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学科,目的是探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谈及生态民族学,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是只关注于当代我们看到的東西,还需要关注人类诞生之后,在文明时代来临之前的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长时段活动。生态民族学一开始是由“文化生态学”发展而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威胁到了人类生存,民族学家们开始对生态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民族学家开始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以及人类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又是如何逐渐适应生存环境,并逐渐形成不同的传统文化。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开展,国内的生态民族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很多学者们不仅关注到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更关注到了地方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共赢关系。事实上,有学者就曾关注到,在今天,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不是原生环境,而是少数

民族人民在不断生存、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之后形成的次生生态环境。而这一次生环境在学界中被称为“民族生境”,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二) 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生态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着70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后,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话题,生态人类学在国内的发展也有了明确的方向。2004年人类学高级论坛上最终形成的《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对于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到了近代,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地方与生态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当地传统的文化知识运用、当地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程度和互动机制。二是民族生境与文化以及环境变迁。三是生态移民和生态补偿的问题,其中,生态补偿较多关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文化价值评估。

其次生态民族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民族学上把人类生存文化类型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以及农业和工业文明等几大类型。不同地域生活的人群都在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下,不断适应周围环境条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社会文化体系,人类和自然是天然的“共生”关系,我们既要从事处环境中获取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资源,不断按照自身族群文化发展的需要构建次生环境,同时又必须尊重自然条件,并对维持自然环境的稳定性负有责任。对于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都应该在不破坏文化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下进行,任何用破坏自然环境的代价换来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二、生态民族学在当代的运用

（一）民族文化生态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呼声涌现。人类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应该是顾此失彼的，每个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本身就与人们所居住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保护文化不应该是只着眼于文化自身而忽略了文化所生长的环境，世界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因为自身所属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而支离破碎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一味地强调生态环境而忽略保护文化也是不可行的，应该把生态环境的发展和文化保护统一起来。“文化”和“生态”虽是两个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把哪一个概念单独考虑都不利于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共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兼具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开拓性项目“民族文化生态村”被推上了研究的前沿。

“民族文化生态村”主张根据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以“生境适应”的原理去认识文化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进行文化和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民族文化村概念的提出，是把当地环境与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实现了文化的就地保护。各个民族文化的生成都有其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要想在保护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保持其完整性、延续性和独特性，就必须从文化产生与根植的环境条件出发考虑，不能脱离其产生、培育和发展的环境，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要充分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除了自然环境以外，还有人文条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把当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相结合，既能保留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又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生态与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

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以村民主导、学者指导和政府引导为项目指导思想。民族生态村明确了运行和管理的主体就是本村村民，以村民为主导，除了能更好地调动村民对于传统文化保护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村民主导”同时说明了村民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仅是民族文化生态村旅游收益的所有者和享有者，也是民族文化生态村中的博物馆、研习馆等场所和各种文艺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提倡文化的就地保护，即主张文化不脱离其产生、培育、积累、发展的环境，不摆脱其创造者和拥有者，使文化在根植的生态环境中，由当地人进行文化的利用、保护、

传承和发展”。进行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建设，不能仅从民族文化本身出发考虑，还应该着眼于整体，把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下综合考量。在推进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整个中国目前的生态发展要求和特定的时空条件，对于国外很多学者同类型的保护事业经验范式和理论方法，应该虚心学习，有针对性地借鉴，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基本运作思路是，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以当地村民和政府部门为主导力量，获取相关专家学者的支持，制定发展目标，通过调整不同主体间的协调机制和各方能力建设，在促进当地生态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文化生态保护。

民族文化生态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原少数民族的环境条件和生态文化，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民族建筑物，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较有代表性的聚集地。民族文化生态村所在地区的住民必须先保障自己的生存，然后才可能参与公益事业和进行更多的精神追求。在部分偏远村落聚居的地方，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受到城市化发展影响相对较小，村落中还保留着原有的民俗习惯，民族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当地特色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既发挥了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同时也提高民族文化保护力度，让游客们在参观游玩生态村的过程中，一方面欣赏到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景观建筑，另一方面又参与到互动活动中，加强游客们对于民族特色文化的多方面了解和亲切体验感，拓宽了本民族文化的宣传途径。

（二）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之父乔治亨利维埃是这样定义的：“通过探究地域社会人们的生活及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就地保存、培育、展示，从而有助于地域社会的发展，生态博物馆便是以此为目的而建设的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产生对于博物馆和人类学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社会上目前对于文化事业的目的和功能诉求。但是由于生态博物馆的历史还比较短，要使其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生长、发展并产生深远影响，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探索过程。生态博物馆的建成，也让这些坐落于边远地区、偏僻乡村的民族聚居村落声名远播，广泛引起了社会关注，各方游客、专家、学者和名流等纷至沓来，为发展民族文化与完成保护工作出谋献策。

龚世扬在探索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

程”的回顾中提到生态博物馆的建成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留住了本民族的精神命脉。当地的村民们在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加深对于本民族历史的了解和认知,体会到本民族文化带给他们的更深层次的价值,增强了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调动这一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西的“1+10”的民族生态博物馆新模式,深入收集、挖掘了具有典型性、特色性、民族性的文化、文物以及建筑样式和居住环境等,探索出了一套集生态博物馆与当地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种资源充分融合的新模式,为公众了解和学习感受广西优秀的民族文化开辟了新途径。

在当前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已成为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想真正意义上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就要达到文化交流、沟通和理解以及民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中的文创产品不但能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而且大多数文创产品都是出自生态村中的村民之手,产品的商业价值实现有利于提升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生态人类学的现代价值

现如今国家生态环境治理观念和决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只顾生态文明建设不讲文化,把生态文明建设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的趋势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对生态人类学理论的不断深入了解,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以及结合各民族的不同优秀传统文化,让生态与文化形成一个良好互动。当然在复杂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背景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各种社会资本下乡,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资本对于人地关系的复杂影响。资本的多元性以及其本身的获取利益为目的,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合理运用资本那么就会变成乡村振兴,人类与生态共生的一种阻力。

各方学者们对生态人类学的多方面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舆论、科技手段、旅游规划等资源聚焦于对生态人类学的开发和探索中。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各民族所生活的地域条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提出,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中,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人类学充分融入各个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既让

当地居民在绿水青山中享有物质生活提升的幸福感,又让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实施空间。不同民族在自身不断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本民族与当地生态环境区域共生的稳定体系,人们会根据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条件,主动去适应自身所处的这一区域环境,从而利用和改造这一生态条件,这就是生态人类学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留的现代价值。

四、结语

生态民族学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生态发展等活动的进一步落实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乡村振兴不断深入推进的今天,生态文明与人类发展的和谐共生话题更加成为了一项大家十分关切的话题。如何在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乡村旅游资源真正“活起来”,实现乡村社会传统知识的有效对话。既需要个案的不断积累,从中提炼出普遍性问题;又要重视其间的学术逻辑关系与解释框架重构。民族生态文化村与生态博物馆,只是当前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发展相结合的有效个案,在未来的运用中还会出现更多政治权力结构、经济生产生计方式、文化保护与发展等方面与地区生态环境相结合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 [1] 罗康隆,杨曾辉.生态民族学的当代价值[J].民族论坛,2012(6):45-51.
- [2] 罗康隆,吴寒婵,戴宇.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学科背景与理论方法[J].青海民族研究,2022(1):1-10.
- [3] 罗康隆,杨庭硕,吴合显.从生态民族学到生境民族学的思考[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1):41-58.
- [4] 尹绍亭,乌尼尔.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31.
- [5] 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16(1):143-149.

作者简介:

罗静(1997—)女,壮族,广西玉林人,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